

拼贴城市*

——以武昌高校密集区及其周边“学生村”拼贴发展研究为例

COLLAGE CITY: A CASE STUDY ON COLLAGE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CONCENTRATED AREA AND SURROUNDING “STUDENT VILLAGES” IN WUCHANG

陈 煊

CHEN Xuan

【摘要】针对中国大学校园理性规划及其周边地区自由发展的普遍现象进行多个案例研究,借鉴拼贴城市的概念,探讨城市空间的变异与现实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指出若理性和自由两者都不可取,那么拼贴的现实希望寻求的是一条介于它们之间的中间道路。于城市规划而言,面对现代兼传统、多元而复杂的城市,拼贴现状或许是现代理性规划外的另一种关于空间组织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感性层面的逻辑思维也许可成为当前我国城市更新一种现实的途径。

【关键词】“学生村”;拼贴城市;非正规性;自建;城市更新

ABSTRACT: Based on several case studies on the rational planning of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the unbounded development of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the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collage city to expl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in urban space and the reality of everyday life, and points out that if neither rational planning nor unbounded development is a solution, collaging could be a middle path between them. To urban planning, besides modern rational planning, collaging may be another spatial organization style for cities containing both modern and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showing both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which provides a more realistic method for China's city renewal at the perceptual level.

KEYWORDS: “student village”; collage city; urban informality; spontaneous settlement; city renewal

1 前言

在中国当代大凡读过大学的学生关于自己大学的记忆除了频繁地穿梭于校园内各大教学楼、图书馆、院系楼、英语角外,总有一部分属于校

门外通常被俗称为“堕落街”、“小香港”、“学生村”的一个地方。早课前匆匆拎走早餐,下课后三五成群去那大吃一顿,悠闲自在地说说八卦新闻,讲讲课上仍有回味的课题,争论一下时下的课程设计等等。这样随意交流的氛围中蕴藏着一种无名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放松了紧张学习的神经,同时开拓人们的思维、启迪破解难题。而这样穿梭于校内、校外的拼贴生活也就构成了大多中国大学生真实的生活方式,笔者在此暂时借用“拼贴城市”的概念,特指阅读城市空间形态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打破一般既定边界划分城市地块的方法,通过分析城市空间的变异与现实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来理解和思考原本不连续的、断裂破碎的拼贴城市地区。

2 武昌高校密集区及其周边“学生村”的拼贴发展

2.1 研究范围的界定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范围集中于武汉市武昌区大学密集区,主要交通干线珞瑜路两侧大学及周边的“学生村”(图1)。涉及大学包括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工程大学、湖北经济管理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9所国内知名高校本部校区,共占地1636hm²,学生人数26.3万人。以及高校周边村落7座,占地146hm²(除消失的村落后实际占地为63hm²),居住

* 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经费(531107022055)及湖南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2012)赞助。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经费(531107022055)及湖南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金(2012)赞助。研究同期支撑了申报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新教师基金)及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人口8.2万人(其中原住民9072人)。

2.2 武昌高校密集区及其周边“学生村”的发展

2.2.1 武昌高校密集区的发展

调查区范围内高校校园基本形成于3个阶段：

(1)20世纪初期的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受到辛亥革命后开放和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突破中国古典的学院制,在城市中心新建大学,渐渐校园周边地区也就有了发展。如武汉大学,其周边地区的东湖村、风光村也由原始零星的自然村落合着城市发展而得以扩大,虽多数校园规划开始吸取西方校园理性规划理念和设计方法,但校园与围墙外的自然村落在空间关系上是互为对立的。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高校建设的高潮,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经济管理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此时先后建立。此时的规划蓝本多模仿苏联的大学规划模式和建筑形式,片面追求严谨对称,中轴线、主楼、大广场、周边式建筑等,建筑造型庄严雄伟。此外该时期建设的大学大多选择城郊,在空间上与城市之间的交往相对贫乏,却进一步加深了与城郊自然村落的联系,但始终未能统筹考虑校园规划和地方建设的联系。

(3)改革开放(1978年)前后建立的武汉工程大学和地质大学其选址则多利用城郊村镇用地,如武汉工程大学其校舍的用地均属于周边熊家咀村村镇用地,但其校园规划除了主入口面向村镇外,其他并未考虑与村镇的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校园周边地区开始寻找自身发展的契机,呈现自

下而上的发展状态,并在空间的具体使用中影响了传统的校园空间,校园空间慢慢向着开放的城市体系扩张和变革,沿街道向四周扩散,与周边地区呈现共生的拼贴生长态势,慢慢和周边村落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而难以界定。

2.2.2 高校周边“学生村”的发展

武昌地区高校周边的城中村共有25座(包括现有的和已经被拆除的),占武汉市城中村总数量的15.0%,与武昌高校总数(近50所)的比值接近1:2。从访谈调查的情况得知,案例调查中的大部分的村落形成于20世纪初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且大多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开始寻找依靠大学发展的契机,并多于2002-2004年利用武汉市对于城中村管理的疏松开始了大规模的自建行为,包括占用农田或池塘增减房屋,扩建宅基地、加高楼层等。通过近10年的发展,如今都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且经济结构相对完善的城中村(图2)。虽然对于高校周边的“学生村”大学本身没有所有权、管理权,但多数的高校管理者持排斥的观点,也经常见闻学校管理者不断下达禁令或是直接设立高高的围墙把街道和村落挡在校门之外,或借助政府力量进行拆除整治。笔者将这些城市中存在于校园周边地区依托学校发展而自发聚集一定经营规模的村落称为“学生村”,外表看来只是一般平民的自建住宅区,建筑从2~8层不等,其空间结构基本由一到两条主要交通要道结合小街小巷交错构成,功能主要以服务学生为主的小规模经吃、穿、住、玩等方面;其繁荣的经济也带来了大量的城市移民和就业,外来人口甚至开始大大超过原有村落人口,从而形成了具有复杂居住人口结构和一定经济实体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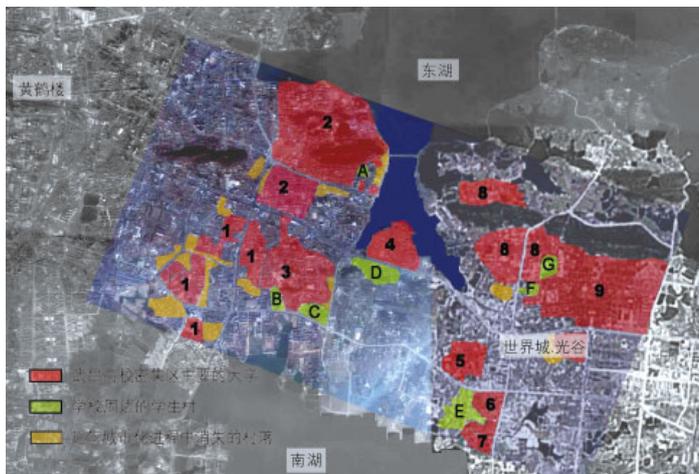


图1 武昌高校密集区及其周边“学生村”地域空间分布现状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niversities-concentrated area and surrounding “student village” in Wuchang

注:图1、图2中标识的数字和序号分别代表高校和“学生村”,具体指代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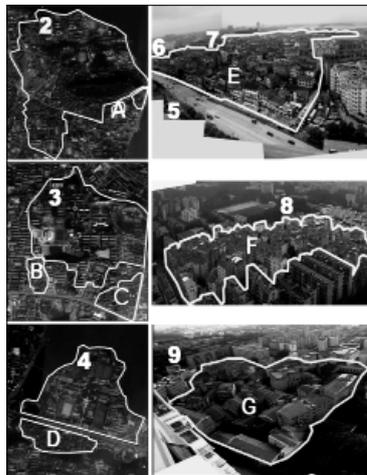


图2 高校及其周边“学生村”的拼贴

Fig.2 Collage of univers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student villages”

2.3 武昌高校密集区及其周边“学生村”的拼贴现状

2.3.1 气派的校园 & 微缩的村

大部分“学生村”在空间形态上主要依托了原村落的形态格局，规模多在30hm²以下，武汉大学旁的东湖村和风光村分别只有4hm²和2.6hm²，华中科技大学旁的彭王村则只有2hm²，而且规模在近年的城市化进程及高校扩建中，呈现明显缩小趋势，甚至有的村落已经消失或逐渐变为了城市街道或高校的发展用地。调研区内的高校规模少则60hm²左右，多则400多hm²。虽然调研的整个村落只有63hm²，只占整个调研区校园占地面积的3.0%，但其村落内共居住的人口却占调研区校园整个人口的31.2%(表1)。

2.3.2 理性的校园 & 自由的村落

区别于秩序井然的理性校园规划，一目了然的几何中心、节点、轴线、主次出口，明确的人流、车流交通，漂亮整齐划一的教学楼，调研区内“学生村”的空间格局则显得自由而感性，但随意中却不失一定的组织逻辑，其街道空间大

都由1~2条主街构成，街道长度从150m左右到800m不等(多数为500m左右)(表2)。其次主街一般都串联着2~3条大小不等、弯弯曲曲、形态各异的次街，更多的巷子则不规则地连接了主街、次街和村民的自建住房。各个村落在整体的形态上和正规的校园空间虽然彼此相邻，形态却完全迥异(图3)。

“学生村”除了在街道的布局形态上异于现代正规的街道格局外，沿街建筑前突出的随意搭建，也使得其空间大都未经规划和设计，但也呈现一店一铺的规律，铺位一般有店内经营者所有。而经营者对街道空间的极度利用和商业聚集使得户主连门口广告位都会进行出租，从而使得在“学生村”不到1m的巷道内挤满了大小、规模及档次不同的商业门面的出入口，其广告和门头招牌重重叠叠使得巷道的景观呈现出一幅幅街道拼贴剪影(图4)。而村民对于建设成本的极度节俭也能使得一栋民房进行了多次加补，不同材质在立面上的拼贴，邻里间通道的搭建而形成的交通拼贴，利用前后住宅空地和阳台加建从而在建筑体量上形成的拼贴(图5)。

表1 武昌高校密集区及其周边“学生村”现状发展规模对比
Tab.1 Comparison on development scales of universities-concentrated area and surrounding “student villages”

编号	武昌高校	现校区建设年代	学校规模	学生总人口	原居民人口/所占总人口比
	周边学生村/街区	形成年代	(现)村占地	居住总人口	
1	武汉理工大学	1898年	300hm ²	45220人	
2	武汉大学(本部)	1930年	336hm ²	45760人	
A	东湖村	20世纪初	4hm ²	4000人	600人/15%
	风光村	20世纪初	2.6hm ²	3500人	500人/14.2%
3	华中师范大学(本部)	1903年	129hm ²	20000人	
B	龙家湾村	20世纪初	3.7hm ²	7600人	1000人/13.1%
C	陈家湾村二队	20世纪初	11.2hm ²	9100人	1900人/20.9%
4	武汉体育学院(本部)	1955年	5.4hm ²	10000人	
D	六合村	20世纪70年代	7hm ²	10000人	1200人/22.5%
5	武汉工程大学	1974年	6.3hm ²	14329人	
6	湖北经济管理学院	1949年	113hm ²	15400人	
7	中南民族大学	1951年	9.6hm ²	10000人	
E	熊家咀村	20世纪70年代	26.6hm ²	50000人	4100人/8.2%
8	华中科技大学(本部)	1953年	435hm ²	56879人	
9	中国地质大学(本部)	1975年	113hm ²	45000人	
F	土库村	20世纪60年代	6hm ²	720人	241人/33.4%
G	彭王村	20世纪60年代	2hm ²	500人	131人/26.2%
	9所高校共计		约1636hm ²	262588人	
	7个村共计		约63hm ²	82020人	9072人/12.8%
	高校总人口与村落居住总人口比		3.0%	31.2%	

注：调查高校规模和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于各大学的官方网站，学生村的数据统计以村管理部门统计公开数据为准，学校周边村落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根据(由于流动人口等复杂性在此只能做大概的估计)据2009年各村委书记面谈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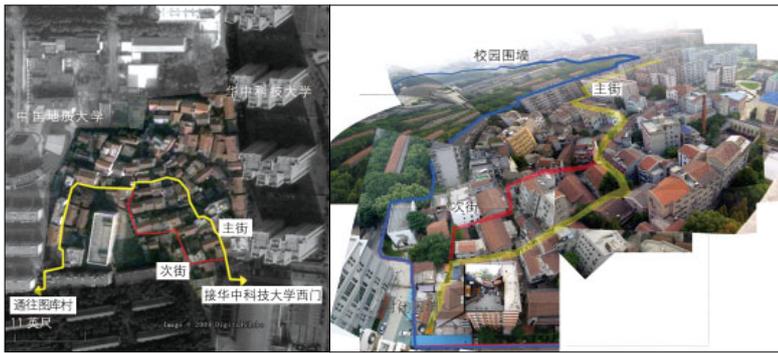


图3 彭王村街道格局(左图主次街分布、右图街道鸟瞰)
Fig.3 Street layout of Pengwang Village (distribution of main and branch streets on the left; view of streets on the right)



图4 巷道广告拼贴
Fig.4 Ads in the alleys

表2 调研区村落街道规模和经济业态统计

Tab.2 Statistics on street scales and economic types in villages in the survey area

编号	A				B		C		D		E	
村名	东湖村		风光村		龙家湾		陈家湾村二队		六合村		熊家咀村	
占地面积	4hm ²		2.6hm ²		3.7hm ²		11.2hm ²		7hm ²		26.6hm ²	
主街长度(条数)	300m(1条)		140m(1条) 130m(1条)		400m(1条)		550m(1条)		300m(1条) 500m(1条)		800m(1条) 500m(1条)	
次街条数	3条均附于主街		2条分附于主街		2条均附于主街		2条均附于主街		2条分附于主街		1条附于主街	
经营项目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餐馆	44	20.56%	52	27.23%	64	21.12%	79	20.00%	68	35.05%	131	17.80%
饮品店、酒吧	13	6.07%	4	2.09%	23	7.59%	10	2.53%	5	2.58%	28	3.80%
超市、水果铺	31	14.49%	28	14.66%	20	6.60%	54	13.67%	13	6.70%	58	7.88%
鞋帽服装店、裁缝店	3	1.40%	2	1.05%	16	5.28%	15	3.80%	1	0.52%	52	7.07%
美容美发美甲店	13	6.07%	2	1.05%	21	6.93%	28	7.09%	5	2.58%	37	5.03%
花店、精品店	4	1.87%	0	0.00%	10	3.30%	6	1.52%	0	0.00%	17	2.31%
KTV、俱乐部、电游店	0	0.00%	7	3.66%	7	2.31%	4	1.01%	4	2.06%	14	1.90%
网吧	4	1.87%	3	1.57%	6	1.98%	5	1.27%	2	1.03%	18	2.45%
报刊书店	4	1.87%	2	1.05%	6	1.98%	0	0.00%	1	0.52%	6	0.82%
音像影碟店	0	0.00%	0	0.00%	0	0.00%	2	0.51%	0	0.00%	4	0.54%
打印社	4	1.87%	1	0.52%	12	3.96%	3	0.76%	1	0.52%	7	0.95%
电信、通信	10	4.67%	12	6.28%	15	4.95%	19	4.81%	8	4.12%	26	3.53%
招待所、旅舍	30	14.02%	26	13.61%	31	10.23%	64	16.20%	50	25.77%	69	9.38%
培训、幼儿园	1	0.47%	3	1.57%	8	2.64%	3	0.76%	1	0.52%	11	1.49%
当铺、彩票、租赁	1	0.47%	2	1.05%	3	0.99%	3	0.76%	1	0.52%	10	1.36%
照相馆	1	0.47%	1	0.52%	4	1.32%	2	0.51%	1	0.52%	7	0.95%
建材、电器、维修	6	2.80%	7	3.66%	5	1.65%	6	1.52%	6	3.09%	36	4.89%
眼镜店	0	0.00%	0	0.00%	4	1.32%	1	0.25%	0	0.00%	2	0.27%
澡堂、洗衣店、开水房	5	2.34%	7	3.66%	3	0.99%	7	1.77%	2	1.03%	16	2.17%
厕所	1	0.47%	1	0.52%	1	0.33%	1	0.25%	1	0.52%	14	1.90%
垃圾站	1	0.47%	1	0.52%	1	0.33%	0	0.00%	1	0.52%	1	0.14%
警务、管理处	1	0.47%	0	0.00%	0	0.00%	1	0.25%	1	0.52%	2	0.27%
摊位	5	2.34%	12	6.28%	21	6.93%	49	12.41%	13	6.70%	117	15.90%
糕点、小吃店	13	6.07%	5	2.62%	14	4.62%	20	5.06%	2	1.03%	25	3.40%
药店、诊所	4	1.87%	7	3.66%	7	2.31%	10	2.53%	4	2.06%	24	3.26%
门面装修	13	6.07%	5	2.62%	0	0.00%	2	0.51%	2	1.03%	1	0.14%
其他(市场)	2	0.93%	1	0.52%	1	0.33%	1	0.25%	1	0.52%	3	0.41%
共计	214	100%	191	100%	303	100%	395	100%	194	100%	736	100%
租房户数	120户		100户		67户		110户		38户		327户	

注：根据笔者2008-2009年间田野调查以及针对性访谈所得数据统计；

由于流动摊贩等商业形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归纳整理经营项目时都以2009年06月中旬12：00-15：00的一般时间段为准进行记录，而在傍晚或者晚上的高峰人流段，流动的摊贩会比统计数据更高；

表格中带黄色底纹的百分比为该村经营项目所占比例的前三位。

2.3.3 后勤集团 & 流动的经济和人口

案例调查中的村落不论区位和规模异同，在整体的经济结构上却有着极大的趋同性，基本维持了传统经济业态特征(表2)。餐馆、小商品超市(含水果铺)，招待所分别占村落整个经营门面数的20%~30%，10%~15%，15%~25%不等，三项之和占整个经营门面数的45%~70%不等，为其主要的经济组成。其次是饮料店、小摊小贩占整个经营数目的10%左右。而“学生街”最为耀眼仍属临时搭建及“来无影、去无踪”的摊贩，这些流动的经济不仅构建了“学生街”自由随性的空间特征，同时一处处的流动书架、二手市场、夜市等也为村内和村外的人提供观察外部世界和交流的好去处。这种大多以小规模经验为主(约占整个经济规模的80%左右)，品种门类却多达30~40种之余，门面的总数据统计少则200家左右，多则达700多家(统计不包括出租户数)。相比之下，在大学的正规校园里，为学生提供后勤服务的主要有大型后勤集团公司统一管理的超市、食堂和市场，其数目一般在10余家左右。此外“学生村”内经营品种的多元化及经营时间的延续性也非大学校园的超市、食堂所能企及。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租房经济，出租房户数占整个村民总户数的90%以上，有的村落甚至达到98%。近年来也陆续有村民开始搬离村落，将整个自建住宅均用于出租，由此导致了原居民人口只占总居住人口比例的10%~30%，有的甚至还低于10%，比如熊家咀村原住民只有4100多人，占总人口比例为8.2%左右，租房规模却占总经营规模的56.6%，且村内总居住人口超过了周边3所大学的总人口。而六合村的人口也远远超过了武汉体育学院人口近50%(表1)。

3 “学生村”的兴衰：空间权力的控制与抗争

3.1 抢建、乱建和统建楼：东湖村和风光村疯狂的收租

“学生村”的存在和发展最直接的收益者

除了学生以外就是当地的原住民。村民在面对学生带来的巨大的消费需求后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能力，从而在校方强力管制、城市社会舆论压力和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下奋力抗争。如东湖村和风光村，两村相邻且位于城市中心地带，背靠武汉大学面临武汉东湖景区。良好的区位条件使得村庄的建设也颇具天机且发展较为成熟。至2009年村内居民约260户(且90%住户仍居住于此)，占村内总居住人口的5%，其余95%为外来人口，多为武汉大学成教的学生，网络大学的学生，自考的学生等。据村民介绍1990年底开始有学生租房，且供求日益不足，当初这里大部分都是1~2层的房子，除去自家住房外，并没有太多的住房可供出租。面对巨大的市场，村里有钱的人于1999年开始向村大队申请加建，于2002~2004年达到建房的高峰期，也开始有村外的人来村内买房子，买了村民旧房子重建新房，建的楼层也越来越高。发展到2004年的时候村庄的密度约为目前建筑密度的60%~70%左右。如今密密麻麻的房子如果按建筑面积计算约90%没有房产证，虽然政府相关的管理部门于2007~2008年间陆续来了有100多人，拆掉了十几栋房子，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太平期，面对巨大的租金收益村民们又开始冒险建房，而且愈加大胆。

访谈中居民甲毫不忌讳的诉说了其家自建的发展过程。居民甲一家七八口人，1980年代初仍有池塘和田地加起来有近10亩，后因城市建设和大学的建设不断压地，使得原有大部分池塘和田地被压完，保留了老宅和院子，1990年代初孩子长大，扩建了自家住宅，并将院墙往外扩了1~2m，缴付村大队约2万元建设费做为村内公共财产(以100m²基地面积算)，2000年前后子女长大成人，居民甲的3个儿子分别挨着原有的老房子，在原有的院墙内和街道两旁的其他空地新建了自家的楼房，大儿子是2002年建的，每层110m²，共7层，建筑面积为770m²，居民甲自家的院子为3层，50m²/层，总建筑面积为150m²，其余两个儿子于2007年在老房对面的街道空地合建，每层100m²，共5层，总建筑面积为500m²。这



图5 “学生村”建筑在立面、材质、体量上的拼贴
Fig.5 Facades, materials, scales of buildings in “student village”



图6 拆迁中的彭王村(左图:2008年7月;右图:2009年7月)
Fig.6 Pengwang Village amid demolition (left: Jul, 2008; right: Jul, 2009)

样3个儿子的两栋建筑约有120个房间可供出租，以平均价150元/月计算，居民甲整个家庭依靠出租房每月的收入约18000元纯经济收入，而这部分只是出租住房收入，如上文所述门面租金、摊位租金、广告位租金等等这一系列与居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收入都使得村民不断压榨村镇的公共空间，自建成风，抢建、乱建和统建楼日益严重。

3.2 变幻的政策、缺失的管理：六合村的踌躇和无奈

谈到位于珞瑜路和卓刀泉路交叉口六合村的发展，六合村的村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针对目前拥挤的空间状况村长提到了自己的观点，据介绍至2003年，村内自建住宅没有3层高的，大都为平房，但是自从被某开发商看中后，这一切的讯息使得村民敏感地嗅到了即将到来的拆迁。尤其看到开发商丈量村内住房及挨家挨户的调查，进行了20次调研，最长一次调研时间达5天，村民开始翻新、加建，在开发商为期半年的评估过程中，自建房基本也都加高到了4~6层，原有的评估也基本不具备可操作性。当初准备了1个亿做收购的计划到此时估计3个亿也不能完成，只能作罢。之后再次传来一些将要拆迁的消息村民仍然采取见缝插针肆意地建房，认为在变化莫测的拆迁政策面前加建楼房争取获得更高的赔偿是其惟一能做的上策。

“学生村”除了抢建、乱建和统建楼问题，还有公共空间、环境卫生等问题，此中的原因不可不提政府管理的缺失。而缺失和变更的背后暗藏着做为城市街道底层管理人员无奈。仍以六合村为例，目前在行政管理上已统一划归属卓刀泉社区管理，虽然看起来仍然是颇具自然村落特征的村子，但实际上早已演变成了集学校、村湾、单位组合型于一体的混合社区。在红线范围内共计400多栋建筑，除去六合村原有居民1200人，还包括14家单位宿舍，外来人口总数达到1万多人。按照人口规模国家民政部明确规定应自由管理，社区同治，而对于混合型的社会和单一单位社区的管理人员配置的标准相同，按照1500人以下的村子配3个行政管理人员，则六合村1200人只能配备3人，可实际情况六合村居住人口上万。管理工作的艰巨和繁琐使得村干部们只能抓重点，比如针对环境卫生问题，可以简单算一笔帐。六合村的卫生费由村委会收，同时负责村内的卫生工作，按照市政府给予的收费标准以人口规模计算该村一年可征收2万元，但同时需上缴1.4万元给政府部门(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负责卫生工作)，剩余的6000元就是正规的可以自行处理该村环境卫生问题的开支。因六合村现有的建成

区7hm²均是沿山而建的，卫生工作相当困难，加上占道经营、乱贴广告、乱丢垃圾、乱搭乱建的，所以根据实际情况需雇佣7人(每人负责1hm²的建成用地)完成此工作，雇来工作人员工资最低700元/人/月，那么一年合计7人×700元/人/月×12月=58800元/年，可事实可用于支配只有6千/年。5.88万元/年的开支还不包括维修卫生设施，如公厕、垃圾桶等。巨大的开支即使将政府规定可收缴的费用2万元均用于维护和改善村内的卫生、环境工作，仍然只是冰山一角，除去卫生、环境工作，治安工作更让基层干部头疼。

3.3 地产的争夺、利益的交涉：彭王村的消失

高校、村落、城市在各自发展的需求下，在不同时期都表现为地产之争，而这里面更能体现出交易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利益交涉。现已搬离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旁彭王村的原村长在谈到今已不复存在的彭王村几次大型的失地之时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之中。据介绍除了1953年华中科技开始新建校园占用了大半空地，到1980年代村里开始卖空地，比如说卖给工厂，在当初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的前提下，互惠的交易模式得到大多居民赞同，因为能成为城市居民，到买地的单位工作也是一件让村民羡慕的事情。这种交易下，村里在卖地时候往往附加了解决一定数量村民的工作、户口问题，当然资金、户口、就业这三个条件可以弹性地互变。比如在1980年代华中科技大学向彭王村买了近20亩左右的土地(大部分是空地)，压地地块涉及到10户居民，华中科技大学负责赔偿价格基本在3万~10万/栋(根据房子质量和建筑面积)，10户拆迁户转为城市人口，并安排部分年轻人在华中科技大学做后勤人员且给予一定补贴^①。此后的中国地质大学几次压地开发模式大都依据该模式来进行。

到2007年中国地质大学向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先后呈送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关于迁移彭王村建设教职工住宅小区的请示》等报告，并得到了省、市政府的支持。时至2007年8月武汉市政府将所剩约2hm²用地的彭王村定为旧危房改造项目，并通过土地“招拍挂”筹集危改资金，土地出让价格以拆迁成本及前期工作成本之和作为挂牌底价，中国地质大学通过竞标获得该地的使用权，用地性质为中国地质大学教职工住宅开发。2008年9月彭王村的墙上出示了有关拆迁的通告，2009年9月彭王村大部分房屋被拆毁，炙热的土地上零星的树立着几栋居民自建房(图6)。访谈中相关管理者表示其拆迁已经远远的延误了工期，从最初的3个月的拆迁计划改至6个月、一年、一年半，可见在居民非自愿的情况下

其协商的过程是艰难而缓慢的，但最终搬迁的惟一结局却毋庸置疑。

而“学生村”的普遍存在不仅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开发商的到来是每个村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事件。目前所呈现各种发展状态无不是对高校本身和周边地区空间权力的控制与抗争。早期大学新建校园不断压地周边村落的用地，基本可以称之为双赢互惠的模式，在单纯的年代呈现更多的是你情我愿的局面。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高校的扩建用地需求、城市发展带来的地产升级使得很多“学生村”都面临生存危机，调研区内的“学生村”或其他特色街区、村落往往难逃被城市打散或被新的规划建设逐渐吞噬消失的命运(图7)。

4 几点思考

4.1 乌托邦的衰退：理性的规划、多元的生活

回顾我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不论是旧时的书院、府邸、衙门，还是后来独立单位制校园，高校基本是区别于城市而存在的，大学培养的是少数的社会精英，实行的是封闭管理。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学教育开始从精英型转向大众型，教育产业化发展，高等学校不断扩招。从某个角度来看，校园规划更多的是关于校园更新发展的理念，而决策者现实的意识形态中更倾向于展现未来世界的完善秩序，将一个美好的城市空间结构看成为可预见的、可规划和控制的，一种关于启蒙运动之后的行为派乌托邦。

一方面乌托邦的理想、另一方面多元的生活

都影响了当下中国高校的空间可能发生的变化，它反映的是一个特别地域性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关于高校及周边地区生活、社会资源使用的文本，是对大学生关于正常城市人生活的一个自发的缅怀。抛开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做为决策者应该清醒地从中认识到当代大学生现实生活多元化的各种需求远远超过了校园规划所能够思考的范畴。“学生村”的繁荣发展不仅反映了城市中商业机能的变化及经济的发展，同时学生主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多样性。而正是这种多样性粉碎了决策者对于完美秩序乌托邦境界的幻想，同时也暗示了一种对城市空间无序的热爱和个性的理解，对理性的反感和对多元化的热忱。虽然在现实中，空间的无序性肯定不那么容易把握，它涉及到一个十分有趣的“偶发”理论，倾向于建构一种多元世界。大学校园或许更应该回归为最本质的城市“街区”。

4.2 中间的道路：拼贴的城市、冲突的利益

拼贴和城市结合到一起，意味着什么？很显然，这是针对于现代理性城市规划思想之上以及精英价值观的一种破译。从前文的案例分析中首先可以看到大多校园规模的扩大都依赖于向周边村落用地进行征地，从空间的形态上看，越发不规则的校园用地和“学生村”早已唇齿相依，呈现出镶嵌共生的态势，如：武汉理工大学校园由5个片区组成，“学生村”的用地散落其中，“学生村”内的多处地产开发等从城市肌理来看无不显现出拼贴的痕迹。从人口和就业的相互交融来看，在高校早期扩建压地的过程中，高校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这些人员仍然在各大高校内服务；“学生村”相对较低的创业平台和宽松的就业氛围，为高校中想进行创业的大学生们提供很好的机会和锻炼场所，而商业地产开发带来的是更复杂的社会人口。如此等等高校和“学生村”的拼贴特征并不仅仅是空间肌理上的更是社会生活的拼贴，而类似的多元城市拼贴现状也是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城市更新所面临的典型问题。在涉及到城市问题研究时，通过所有理性的数据收集整理后而得出的“最终”解决方法的概念明显是一种价值认识论的体现，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在不断发生的利益冲突面前变得无稽、无力。因此在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的巨大差异面前，“拼贴城市”应该是城市更新一条折衷之道。这些差异不应当造成鸿沟和对立，应当成为正常城市生活多样性的一部分。因为城市在本质上是多元复杂的，“拼贴城市”就是对城市多元复杂性的响应和体现。这并不代表完全拒绝现代主义的城市理想，它允许乌托邦的存在，但反对将乌托邦的理想作为绝对和惟一的价值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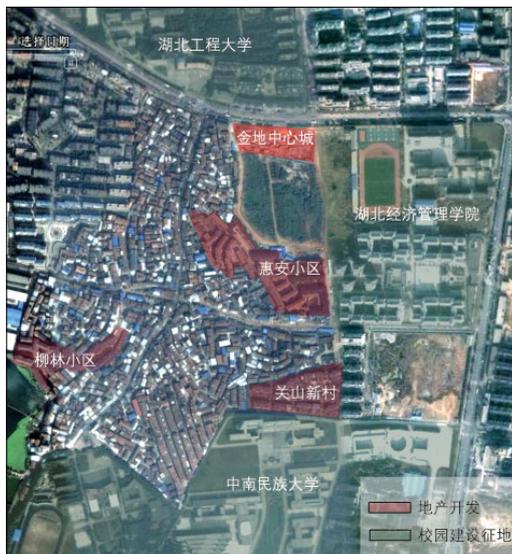


图7 熊家咀村内的地产开发

Fig.7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 Xiongjiazui Village

显然，一个过多以传统城市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不仅直击理性规划理论的可信性，也让人们无法直接面对当代城市的其他挑战。因此在冲突的价值体系中“拼贴城市”更应是可行的道路，它本质上是一些观点之间的碰撞、妥协，并可以在现实中得到足够的应用，惟一的结果应当在利益冲突中寻找，在一个多方永久持续的争论中寻找，从拼贴的现实中得到启发，自然地随历史的演进而演化。其目的是驱除幻想，同时寻求理性与感性、秩序和非秩序、简单与复杂、永恒与偶然的共存，它们在思想上必须是共存和互补的。事实上，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界限正趋于模糊，并在不同时期会发生相互间的转化。

4.3 社会的协作机制：外部性的弱化和利用

“学生村”的负外部性^①在外界的一片讨责声中显得异常明显，无序极端的建设带来再次开发困难、公共空间的侵占、环境卫生问题、仅依靠租金生活的村民就业问题等很容易使村落发展本身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之中，乱搭乱建，产业不断矮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与此同时，高校的经济外溢、土地之争带来了一定社会公正问题等这一系列负外部性特征，似乎也展示了在没有良好的社会协作机制平台上，参与竞争的各方会极端地使用自身的资源从而得取自身对于空间的占有，不惜牺牲公共或他人利益，社会原本的信任机制和游戏规则被打乱，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城市空间则向着更为无序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忽略了“学生村”带来的正外部性，在调研中就发现多家专门走“学生村”经营的路线的品牌，比如港饮之港奶茶、么么奶茶、智勇瓦罐汤、阳光旅社等等。这些老板均表示希望借“学生村”的平台为突破口，创造自己的品牌的梦想。而在熊家咀村委会因较早引入市场机制，利用早期卖地得到的资金，集资兴办了不少村办企业，除了解决了部分的村民就业和养老问题，取得较好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又改善了村内的基础设施（道路、电网等）和环境。而这种滚动开发的模式正是结合社会民间力量而初步建立社会协作机制的结果，从而为武昌区城市经济做出极大的贡献，并部分地分担了政府的工作负担（包括了治安、防火、防灾这一临时突发的情况下，社会自救的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

外部性于城市规划而言更像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如何弱化或利用则更多依赖社会的协作机制。调动社会的力量的同时并分担投资的风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空间权力的重构，形成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但是又能够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管理和建设模式，共同承担城市更新的重任，于政府而言也可以减少工作管

理的重荷和旧城改建的压力，将其责任主要放在建立和谐的社会平台，经营状况的监督等方面。

注释(Notes)

本文所阐述的高校建设年代指的是目前所使用校园的建设年代，而非指其高校形成年代。

武汉大学由美国建筑师F. H. Kalse(1899 - 1979)主持规划。清华大学由美国建筑师Henry K. Murphy在1914年主持规划。后者首次在大学校园的周边地区，用河流围绕，形成通透的空间形态。这种规划格局的突破，对中国其他校园规划及周边区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据来源：武汉市武昌区城中村改造，华中科技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

学生村用地都属于集体用地，在近年的城市发展中慢慢开始划归到附近的城区、乡、村、镇所有和管辖。

整个调研区总人口数目262588人是根据各个学校官方网页的人口统计求和而得，而实际上这部分的人口和在大学周边“学生村”内居住的人口有部分的重叠，因此，村落居住总人口与大学总人口的百分比会高于统计的31.2%。

熊家咀村旁的武汉工程大学、湖北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南民族大学三所大学的总人口数为39729人，而熊家咀村居住总人口为50000人，三所高校人口之和与周边“学生村”两者之差为10271人。

据武汉大学基建处主任介绍武汉大学由于校舍供应紧张并不为该部分学生提供学生宿舍。

对于六合村的资料、数据整理来源于对六合村书记和村长，武汉洪山区卓刀泉社区主任朱主任的3次访谈记录整理而来。

时隔第一次田野调查后一年，笔者于2008年9月再次对所研究的案例地区进行调查时，陆陆续续的听闻“学生村”将被大学或开发商收购的消息，熙熙攘攘的街道也充斥着人群彷徨、无奈的气息。到目前确定的是土库村(F)已经被华中科技大学收购，彭王村(G)被中国地质大学收购，拆迁工程正在进行中，而彭王村经过历史为期一年的拆迁运动，于2009年9月基本完成了拆迁，据村长介绍，村民们也分别搬迁到了武汉郊区的各个角落，无从寻觅。拆迁与开发的模式也从单一的大学主持变为大学与开发商的合作。

当初办理城市户口的等级，需向公安户口机关缴纳城市人口增容费1万元/人。

① 过去的10年的财务及交易地价均无据可查，已被销毁，但据估计当时20亩地价格应在100万左右。

② 外部性(Externality)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指一个人或主体的行为直接影响他人的福利，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界外成本、界外效应或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引自维基百科。

⑬ 文章图片未标明出处均由笔者自摄、自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William Rowe.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 - 1895[M]. USA:Stanford, 1989.
- 2 Charles Jencks, Heteropolis[M]. Britain: Academy Editions, 1993.
- 3 Nezar AlSayyed,Aanya Roy,Urban Informality: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Asia[M]. USA:Lexington Books, 2004.
- 4 Aanya Roy, Urban Informality : Toward an Epistemology of Planning[J]. JAPA,2005,71(4).
- 5 Y Liu, F Wu, Urban Poverty Neighbourhoods: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ntration Under China 's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J]. UK. Geoforum, 2006 (37).
- 6 [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包亚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上接第13页)

的,显示出对时间的依附性质,不同时代的特征相互关联,集结为城市空间文脉,是时间因素最直白的表现(图6)。

5 结语

本文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将城市空间视为时间化的空间。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将这样的城市空间称为“容器”：“城市从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其中,贮存是空间属性,是历史积累在三维概念中的“广延”性存在;流传是时间属性,是历史积累在四维概念中的“持续”性存在。因此,只有建立包括时间在内的“四维城市”概念,才能真正把握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脉,对城市遗产进行更为有效的保护。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 2 [美]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

- 7 [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8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和阐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9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10 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1 [美]保罗·海恩,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M].马昕,陈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 12 [美]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M].董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 13 段川,饶小军.空间档案:“城中村”改造过程的权力控制与抗争[J].住区,2006(1).
- 14 杨旭.城市中“劳动人民”社区的改造及发展[J].住区,2005(2).
- 15 陈焯,魏小春.高校外周边地区“学生街”现状调查研究——以湖南大学“学生街”为例[J].建筑学报,2006(10).

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M].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3 [意]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M].施植明,译.台湾:尚林出版社,1995.
- 4 刘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社会时-空特性初探[J].哲学研究,1991(10).
- 5 龙先琼.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J].齐鲁学刊,2011(1).
- 6 王富臣.形态完整——作为城市设计的一种策略[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9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 10 [德]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J]//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
- 11 李敏泉.蒙太奇思维与城市文脉中的环境设计[J].新建筑,1989(2).